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发展问题对 中等收入陷阱的制约及对策研究

荀守奎

(安徽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摘要: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变化显著,但问题也不少。诸如:积极性降低使农民减少、生产组织分散及生态恶化使粮食危机增加的农民和农业问题;农村人求学困难、就业压力大与社会保障负担重问题;住房混乱、公共产品短缺、土地占用与浪费问题。这些问题很可能导致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值得深入研究,并探讨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 城镇化;农村发展问题;中等收入陷阱;对策

中图分类号: F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101(2012)02-0033-06

On the restrictions of and countermeasures to rural development problem moderate income trap against the urban background

XUN Shou - kui

(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Despite the remarkable changes in the rural areas during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of peasants and agriculture: the falling motivation decreased the number of peasants, grain crisis augmented by loosely-organized production and deteriorating ecology; great difficulty in rural schooling, enormous pressure for employment and heavy load of social safeguard; disordered housing, shortage of public products, and trespass and waste of land. Those problems are most likely to trap Chinese people into moderate income, which are worthy of in-depth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s of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urbanization; problems of the rural areas; trap of moderate income

近年农村及小城镇发展明显滞后。为此,各地掀起城镇化热潮。事实上,城镇化使许多农村变化显著,但也带来新的问题。农村新旧问题夹杂,不仅影响农村持续发展,也影响国家整体发展,并最终可能导致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与城镇化初衷不符,也与中央“五个统筹”战略不符。因此,深入分析农村发展问题很有必要、且意义久远。

一、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

(一) 农民和农业问题

1978年中国推行的土地家庭承包制改变了农业生产方式,刺激了农民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效益逐渐好转,农村极为落后面貌逐渐改变。土地家庭承包也使农业改革成为工业改革的

收稿日期:2012-04-23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安徽沿淮及北部地区的城市群综合环境评价与快速发展路径创新研究(AHSKF09-10D29)”、安徽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安徽城镇发展对增长陷阱的制约及科技路径(12020503077)”、安徽省社科联项目“科学构建安徽沿淮城市群城市梯度及培养其增长极研究(A2010010)”、安徽省教育厅教研项目“交叉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路径研究——以环境资源与发展经济专业建设为例(20100427)”和淮南市科技局项目“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路径研究——以淮南市为例(2011A07909)”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荀守奎,男,安徽淮南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环境经济、区域发展与金融研究。

主要诱因。但是,近年由于种种原因,农业发展累积的许多问题日益严重,亟待改变。

1. 积极性降低使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日渐减少。(1) 积极性降低。多年来国产农产品价格较低,而农业成本却由于化肥、农药、种子价格影响不断上涨,加之农村曾存在的繁重税负,使农业利润率极低。况且,很多农村靠天吃饭现象严重,自然灾害频发导致获利更难,也使农业积极性逐渐降低。明显的例子是,干旱时大部分农民都采取消极等待而不愿主动灌溉农田。(2) 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日渐减少。源于20世纪中期的户籍制度导致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随农业同步改革,农村人在就业、求学、住房、保障上与城市人差异明显,较差的生活条件和质量导致大量农村人想方设法离开农村。正巧,中国东部快速发展和各地城镇化提供了契机。由于可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远高于农业很长时间的收入,所以很多农村人期望进城打工,留守农村和农业的主要是老弱病残和妇女。这一切使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日渐减少,而相当多的农村人只是具有农村户籍,已不再是真正农民。现在农村会种地的年轻人已寥寥无几就是很好证明。

2. 生产组织分散不利于农业广泛应用新技术、实现规模经济、提升竞争力。(1) 不利于农业广泛应用新技术。计划经济时“大锅饭”生产方式严重阻碍了农民积极性,这正是土地家庭承包的原因。土地家庭承包解放了生产力,但也存在局限。土地承包使农业生产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而且为了公平,很多农村的土地被分割成若干小块。这导致农业生产组织过于分散,不利于大规模机械化或集约化,致使先进技术无法广泛应用。(2) 不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等观点,由于农产品具有鲜活性、不易储运,导致农产品本期价格高低会影响下一期产量,而下一期产量必然制约该期售价,这又影响更下一期产量。如果没有外界干预(如宏观调控或期货引导),这种变动性就具有蛛网周期(cobweb cycle)。蛛网周期使农业生产具有很大波动性。况且,一家一户生产很难发挥统筹作用,因此农业生产更加不稳定,要实现农业规模经济必然很难。(3) 不利于提升竞争力。由于缺乏科技含量和规模效应,所以国内很多农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虽然近年由于中央意识到问题严重并采取惠农政策,不少地方农业已逐步采取规模化、集约化、生态技术,但绝大部分农村仍是科技含量不高的传统家庭生产。

3. 生态恶化使粮食危机日渐增加。上世纪主

要是80-90年代,由于农业生产缺乏监管和农民逐利的盲目性,导致大量河坝、滩涂、沼泽和森林被开垦成农田,其结果使植被和水利工程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另外,近年国家非常重视大江大河的利用和治理,明显忽视了农村小型、微型水利工程的持续治理。虽然这种局面自2011年有所好转,但支持力度不够,而且存在明显的形式主义。再由于世界范围异常气候频发,各地水环境相当脆弱,而城镇化导致的资源需求扩张必然促使生态恶化。由于生态恶化,加上利润率低,全国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越来越小,粮食危机的潜在风险和危害不断增加。

(二) 人口、求学、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

1. 人口压力依然存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已深入人心。由于计划生育,全国人口增长减缓很多,但由于基数大,人口压力仍很大。2011年末中国人口已达134700万,且问题不少^[1]。在农村、城乡结合部,一对夫妇只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仍较少,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漏洞多。农村人口强大压力使农村新旧问题不断积累、激化,并逐步传导到城市和城镇。

2. 求学困难。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在世纪末达4%,1995年教育法规定比例应不断增长。这些目标至今未实现,而落后的农村更为严重。教育资源缺失使许多农村贫困人口、女性不能完全享受9年义务教育,绝大多数孩子初中后就辍学、打工,而能读大学的孩子比率极低。另外,户籍限制也使农民工子女上学存在困难。

3. 就业压力大。农村孩子辍学也可能与就业压力大导致的“上大学无用”有关。近年由于农业收入增长不快使农村就业岗位无法满足众多人口要求,而各地不同程度的机械化也使农业不再需要很多农民。于是,农村就业压力增大。当由于城镇化使农村富余人口大量转移时,城市或城镇自然出现就业难、住房困难等“城市病”、以及每年难以解决的春运问题。

4. 社会保障负担重。(1) 医疗保险。旧的农村合作医疗曾经失败。2003年“新农合”提出由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并承诺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只要参保农民每人年缴10元保费,中央、地方政府分别补贴20元。2008年补贴提到40元。2010年提到120元^[2]。2011年提到200元。目前参加医保农民不断增加:2011年“新农合”比例已达97.5%,基金支出总额1114亿元,累计受益8.4亿人次;参加城镇医保的农民工也达4641万

人^[1]。但是,由于许多农民和农村集体财力仍不强,加上补偿、监督、信息不对称、跨区结算等障碍,“新农合”发挥的作用仍不足。(2) 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一直采取国家、集体和个人共担、个人为主的方式,但由于经济实力、观念等,因此农村参保比例较低,养老保险作用很小。2011年底农村参加养老保险共有32643万人,农村养老服务机构3.2万个,收养各类人员只有182.8万人^[1]。当前各地人口已有不同程度老龄化,农村人口养老压力极大。(3) 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等。2011年底农村居民共有5313.5万得到最低生活保障,552万得到五保救济^[1]。相比众多农村人口,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等保障作用太低。况且,近年各地城镇化导致越来越多农村人失地、“被上楼”、“被城镇化”,失地人口短期富裕掩盖不了再就业、收入持续、长久生存危机。

(三) 住房、公共产品、土地问题

1. 住房问题多。中国人有置地置房传统。由于土地家庭承包、“打工潮”先后使农村收入增加,农村人住房热情也随土坯草房、砖瓦房、混凝土楼房不断变化。但农村住房问题较多,除了因为一些人到城市、城镇购房助升房地产泡沫外,主要还有:(1) 规划混乱。这在很多地区(比如包含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市和六安市的霍邱、寿县在内的安徽沿淮及北部地区^[6])都存在。常见主要因为人多、缺乏严格规划监管,一些农用地因家庭承包而变成晾晒场、后变成住房用地。住房规划混乱影响农村美观、浪费耕地,也影响道路建设。(2) 房屋空置。不少打工者回农村建房,建成后长期空置,导致土地和财物巨大浪费。(3) 质量隐患。由于缺乏有效质量监管,加上为省钱大量使用空心砖、立砖建设,一旦出现自然灾害,人、财、物危害巨大。(4) 很少考虑新能源利用。这不利于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被广泛开发,不利于碳减排,也不利于改变农村卫生条件、生活质量。当前,不少农村开始利用沼气,但普及面不广,且很少考虑商业化和发电功能。

2. 交通和其他公共产品不足。“村村通”工程使农村村与村、乡镇间交通改善明显。但中国地域辽阔,许多农村地处偏远,由于地理限制,所以交通问题仍不少。而住房建设混乱也使村内、村与农田间道路存在较多问题。其次,由于农村人多是需要时自己从河流、湖泊、渠塘中取水,因此水资源利用不健康、不稳定、不有效。再次,由于草木秸秆丰富,所以虽然近年有些农村开始使用煤炭和天然气,但大部分农村使用燃料仍自给自足。这对在农

村推广公共产品服务改革产生较大阻碍。

3. 土地占用多、浪费严重。2009年底中国耕地总数18.26亿亩,已接近18亿亩红线。人均耕地不足1.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发达国家的1/4,只有美国的1/6、阿根廷的1/9、加拿大的1/14^[7]。即便如此,土地浪费严重仍存在,主要原因如下:(1) 城镇化占地多。城镇化使城镇边缘外溢、工业项目不断上马,这必然导致大量农村土地被城镇化。而由于缺乏科学规划和有效监管,城镇化中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情况严重。比如,各地大广场、大绿地现象导致土地开发强度、建筑容积率低。城镇化使农村生存地域空间越来越小,其危害必然越来越大。虽然中央已意识到问题严重,并于2008年颁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但效果尚需谨慎评判。(2) 农村自身浪费大。目前许多农村原有占地没减少,新建房屋占地又变多。其中包括许多宅基地被丢弃的原因。宅基地被丢弃不仅破坏村容村貌,也导致土地极大浪费。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借助于城镇化、集中新建农村住房、将腾出的宅基地复耕或等量转到城镇有一定道理。另外,由于无序开垦导致土地生态破坏而不能被利用、进城打工导致土地被抛荒、农村殡葬改革不彻底导致土地浪费,也是农村主要土地问题。

二、农村发展问题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

(一) 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和特征

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增长陷阱之一,与人均GDP有关。按世行2008年划分,人均GDP小于90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906-3595美元为低中等收入国家;3596-11115美元为高中等收入国家^[8];此限之上为高收入国家。一个国家发展一般经过三个阶段^[9]:一是从低收入到低中等收入。这一阶段要素高投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由于有后发优势和对外开放,目标易实现;否则会掉入低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典型是老挝、埃塞俄比亚。二是从低中等收入到高中等收入。如果转型成功,经济持续增长;否则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典型是泰国、马来西亚。三是向高收入过渡。如果转型不成功,会掉入高收入陷阱。高收入陷阱典型是有文莱、沙特^[10]。2011年中国GDP为47.1564万亿元,人均超过4000美元,已进入高中等收入阶段。如果转型不成功,终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据世行报告和学者观点,

可理解为,在一个经济体人均GDP从低中等收入向高中等收入上限突破过程,由于某个曾在由低收入到低中等收入阶段发挥作用的因素具有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将其作用抵消,把人均GDP拉回原来水平,以至于经济体很难顺利突破高中等收入界限、进入高收入阶段。

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主要有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和资源环境。中国城镇化正如火如荼。若推进不当,将影响城镇发展,还将导致农村发展问题。任由问题持续,终将导致金融体系脆弱、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贫富分化、信仰缺失、民主乱象、农村土地被过度占用、城镇边界过度扩张、基础建设和项目盲目上马、腐败多发等问题出现或加剧。这些问题应是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特征。

(二) 农村发展问题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

1. 农民和农业问题危害。积极性降低、农民减少导致农业生产中劳动力、资本投入不足;组织分散、很难应用新技术和实现规模经济导致农作物种植面积小、产量不足、农业科技含量低、自然条件限制明显;生态恶化、粮食危机导致农产品供给不足,物价上涨。这一切将导致宏观调控和经济结构合理转型困难;而且,加强宏观调控可能引发金融市场的深层次问题,并导致金融体系脆弱和混乱,甚至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停滞或者回落。

2. 人口、求学、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危害。人多是求学、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根源。首先,因为人口压力、教育资源短缺,导致农村人、农民工子女缺乏教育保障。短期看,农村人口求学困难对其本人和家庭产生影响;长远看,将不利于国家整体发展。其次,就业压力导致就业困难、贫富分化。由于就业压力、人口素质差异,必然导致就业差异,并导致行业、地区、阶层和家庭收入差异。据不完全统计,2010和2011年全国不同行业收入差距明显,农林牧副渔较低,而一些垄断行业、金融行业极高。最低行业和最高行业差距甚至达15倍多。再次,由于农村收入较城市、城镇差距大,而农村现有社保体制负担重、财力有限,很难起到调节作用,所以社会贫富分化必然加剧。最后,由于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不同收入的人们间可能出现矛盾。这本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任其发展,最终可能转化成影响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并激发更多矛盾。比如,一些人为改变贫困而不择手段、甚至为此而放弃信仰。于是民主乱象就出现了。

3. 住房、公共产品、土地问题危害。(1) 住房问题主要导致土地被过度占用、浪费。这明显违背

“土地是财富之母”原理,不利于农村和农业持续发展、农村人口长久生存。农业是根本。农业不稳定,第二、三产业发展就难有保证。(2) 交通等问题主要导致公共产品服务短缺。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当农村生产、生活所需道路等公共服务不健全,农村要改变落后状况、实现快速发展必然很难。农村经济增长停滞如果难以避免,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则难以实现。(3) 土地问题危害。首先,城镇化占地过多可能导致城镇边界过度扩张、基础建设和项目盲目上马。城镇边界扩张将使农村生存空间减少,大量农村人口被迫流动,这不利于农村和农业持续发展,也可能制约城市、城镇发展。基础建设和项目盲目上马必然刺激GDP快速增长,这种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发展模式不利于节能减排。其次,城镇化过快发展易导致腐败多发、民生乱象。近年各地城镇化中出现的暴力拆迁严重损害了人民合法利益。拆迁中因为信息、制度、权利优势等导致的“搭便车”、“分配不公”、“假公济私”、腐败等民生乱象,也激发了民怨沸腾。再次,农村自身导致土地浪费问题,其原因及危害往往与住房问题结合。如果夹杂腐败,其影响也和城镇化相似。

三、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对策探究

(一) 农民和农业问题的对策

1. 科学规划农业改革。农民和农业问题有危害,也为农业生产方式改革提供契机。社会在变革中前进。中国农业要提高生产力水平和效率、增强国际市场竞争能力,需继续改革。故应据经济现状、风俗习惯、地形地貌、资源条件等,科学规划各地农业生产方式和技术的改革、土地调整、产业发展的方向。

2. 提高农业获利水平。通过舆论、财政补贴和市场引导,使人意识到农业有利可图、值得发展,并逐步引导土地向种粮大户、种植能手集中,最终实现农业规模化、现代化。这其中,主要因素是财政补贴。当前,种粮补贴水平不高,对提升农民积极性效果不大。将来可采取两种改革思路:一是大幅提高卖粮最低保护价,使农民种粮收入明显提高;同时,减少粮食销售中间环节,增加消费者粮价补贴。二是大幅提高农民种粮补贴,使农民在粮价改变不大时农业收入明显提高。

3. 修订相关法规,促进农村土地合理流转。首先,严控农地用途,适当修订土地流转法律,通过市场化引导土地以出租、入股、转让等方式集中。这样可避免土地抛荒、以及农民在农业中劳动力、资

本、技术投入不足。其次,适当改革农村殡葬制度。当前很多农村推行的火葬制实质是先火化、再分散土葬。这种方式既占地,也阻碍机械化、集约化。农村殡葬应借助于市场化和政府引导,借鉴城镇经验教训,发扬农村民主,逐步推行集中殡葬。

4. 引导发展生态农业。目前,许多农村生态农业主要问题是不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导致污染。为此,政府要对发展生态农业加强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督。具体做法:一是通过测土配方、因土施肥,采取化肥控制技术。二是控制农药使用,降低使用不当引起的污染。

5. 治理农村小水利工程。农村小水利耗资不多,但可改变中国农业长期靠天吃饭局面,其效益久远。为此,政府必须充分重视农村小水利的规划,采取科学措施进行建设和养护。其中,可通过参股方式,充分发挥农民作用;可利用证券市场、金融创新等筹集建设资金。

(二) 农村人口、求学、就业和社保问题的对策

1. 人口问题。人多的压力和危害很明显,但关于中国人口未富先老的论调也不断流行。据称,2000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比例6.8%,与世界平均水平一样;2010年中国老龄化比例13.2%。其实,老龄化问题需要客观分析。适当老龄化使人口负增长可降低人口对环境承载压力,利于持续发展。因此,二胎政策(至少在“十二·五”期间)不应快速放开,而应根据未来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再逐渐调整。而且,面对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二胎政策放开要兼顾公平,否则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

2. 求学问题。(1) 加大农村教育投资。首先弄清农村教育资源缺失程度,制定具体投资规划。其次,根据教育发展纲要,严格执法,确保各级财政资金充分投向农村、落后地区。最后,在有条件地区充分发挥各界力量,适当拓宽农村教育资金来源。(2) 注重农村师资培育。首先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提高农村、落后地区师资待遇,借助于“三支一扶”等最大限度吸引有志之士到农村任教。其次,通过全部或部分资金支持,鼓励更多农村人顺利读完义务教育、高中和大学等。作为条件,要求其学成必须服务地方。(3) 建立对口支持机制。根据各地发展状况,大力鼓励和提倡实力强的城市、城镇对口支援落后农村的教育。支持的方式可以是资金、设备、甚至人才。(4) 重视农民工子女教育。根据各地情况逐步改革户籍制度,适当放宽一些城镇和城市落户条件,使有技术、有能力的农村人顺利加入城镇户籍。在此基础上,适当放宽农民工子女在城镇、城市求学条件,以便顺利接受正

规教育。

3. 就业问题。(1) 发展小城镇。过去小城镇落后,所以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结果使大中城市“城市病”突出。基于这一背景,促进小城镇发展已成必然。其实,区域发展应坚持整体观念。只有小城镇快速发展,将农村过剩人口就近吸引,才能缓解大中城市压力。小城镇可凭借人力成本、土地和区位优势,利用产业地域转移契机,抓住大中城市人才、资金和技术外溢的机遇,实现协调发展。当然小城镇在承接产业转移时要尽量杜绝环境破坏。(2) 农村适当城镇化。贫穷是农村人口大量流动的根源,而农村适当城镇化可消除贫困、增加就业岗位、改善生活条件和质量、降低收入差距、消减人口大规模流动。为此,可适当推进农村城镇化,并大力发展农业现代化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发展旅游服务业。(3) 健全城市人口预警。根据城市发展状况,建立科学有效的人才预警机制,实时监控人口与就业、经济、环境的匹配关系。一旦大中城市人口压力增大,可借助于舆论、政策手段,引导其合理流入小城市和城镇。

4. 社保问题。(1) 推进“新农合”。首先强化“新农合”,力争使医疗保健涵盖所有农村人口。其次,加大政府资金支持,解决当前制约“新农合”发展的资金不足。再者,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改善资金结算系统,实现城乡医疗保险跨区结算。(2) 推进农村养老保险。首先强化养老制度,让更多人明白其好处、主动参与,改变农村养老保险人口比例极低现状。其次,加大资金支持。当前农村老人主要由子女赡养。虽说子女有赡养老人义务,但当各方收入水平低、或某方信仰缺失,容易导致农村老人“老无所养,老无所依,老无所居”,而资金支持可改变这种现状。再次,加强宣传和监管,使农村老年人养老资金的领取得以透明和规范化。最后,加大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养老机构既可以让农村老人规避完全靠子女养老的被动地位,使其安享晚年,还可缓解子女的赡养压力。(3) 重视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等。首先科学确定贫困线。当前各地贫困线太低,使一些年收入不高、但在贫困线上方的人得不到最低生活保障。今后应据各地实际,科学确定贫困线,以使更多的人享受低保。其次,重视失地农村人的保障。尤其应重视城镇化过程农村人合法利益受损、以及长远就业和生活缺乏保障的问题。再次,建立和健全城乡统筹的社保体系,尽可能加大对农村困难人口的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生育保险等支持。(4) 拓宽社保资金渠道。社保资金一直由个人、集体和国家共同

承担。这种方式虽有许多好处,但在个人收入低、集体效益差、地方财力弱时,容易出现因资金不足。为此,可充分发挥证券市场、外汇储备、彩票作用,还可借助个人所得税、资源税、房产税筹资。

(三) 住房、公共产品、土地问题的对策

1. 适当确定城镇化过程。一般认为,农村发展最好路径是“解放农民,投资农民,服务农民,转移农民和减少农民”。虽说城镇化可以实现这些目标,但要根据发展规划,合理确定地区城镇化的时间节奏、有效路径和用地计划,规避农村土地的过快占用和浪费。

2. 科学建设新农村。根据中央城乡统筹发展原则,适度推进新农村建设,尽可能将农村居民点的规划、住房建设和地区发展结合起来。这样可科学规划农村居民点和住房建设,合理利用宅基地和耕地,促进农村生活环境改善。

3. 加大公共产品建设。农村公共产品不足的根源在于资金不足。过去,政府主要采取传统有限的财税手段,因此筹资自然不足。今后可加以创新:(1)借鉴社会保障经验,多方力量、多渠道筹资。(2)借鉴PPP、BOT、BOOT、TOT、BT等市场化创新模式筹资。

4. 增加农民对土地的权力。逐步修改法律,使农民对土地有更多的收益权、处置权,适当提高农民对城镇化占用土地的表决权,避免由于政府长官意志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而强行占地、强行拆迁,最终

避免因为更多农民失地、失业导致很多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 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 2012-2-22.
- [2] 刘峰. 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中集体与个人资金来源的法律思考[J]. 湖南社会科学, 2010(1): 90-91.
- [3] 安徽省人民政府. 沿淮城市群“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R]. 2006-12-31.
- [4] 王立彬. 我国土地利用面临稀缺和浪费悖论 亟待深化改革[EB/OL].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11-05.shtml>.
- [5] 安宇宏. 中等收入陷阱[J]. 宏观经济管理, 2010(1): 72-73.
- [6] 胡鞍钢. “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国[EB/OL]. 中国网, 2010-7-7. <http://news.xinhuanet.com/observation/c-12298924.htm>
- [7] 蔡昉. 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低中等收入陷阱”[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8(1): 15-17.
- [8] 戴培昆. 当前水污染治理的系统思考—建立城乡大循环彻底根治水污染[J]. 水资源保护, 2008(2): 118-119.
- [9] 国家统计局.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告[R]. 2011-04-28.
- [10] 毕宝德. 土地经济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93.